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 包亚明主编

Pierre Bourdieu

布 尔 迪 厄 访 谈 录

文化资本与 社会炼金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包亚明译

布 尔 迪 厄 访 谈 录

**Pierre
Bourdieu**

文化资本与
社会炼金术

包
亚
明
译

责任编辑 唐继无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制 作 裘小沁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包亚明 主编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

包亚明 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7,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522—3/B·234

定价 12.50 元

编者前言

将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这五位当代思想大师收录在一套丛书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强制的文本间性，这对于阅读与理解来说，究竟是一种便利抑或是一种伤害，始终是困扰我的编选工作的一个疑问。聊以自慰的是，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这五位思想大师毕竟都分享了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布尔迪厄在《学术人》的英文版前言中曾分析过他们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他认为福柯、德里达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原本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才不得不为的事。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这一代人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这一代人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看到并经历了这一传统的统治地位的塌陷，因而都被引向了反体制的道路，这一反叛的根源存在于他们与作为一种体制的大学的的关系之中。这一反叛的姿态通常是被作为一个自由降临的、自由决定的选择来体验的，

甚至被作为多少有点“英雄气概”的决裂来体验的。但布尔迪厄却认为这一反叛姿态其实是被社会历史决定的，正是他们所处的奇异位置，使得这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变成了一个可以作出选择的选择性。

哈贝马斯也从这场社会动荡中看到了体制的非自然的、人工的特征，因而合法性问题引起了这五位思想家的共同关注。而在现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批判成为可能，则成了他们都必须回答的共同问题。哈贝马斯与四位法国思想家的分歧与冲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也许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交锋。

福柯在引进权力的同时分析了知识以及非推论性(nondiscursive)实践的各种形式的系统，他宣称权力事实上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哈贝马斯在承认权力的同时，坚持认为权力应当由一个能够在合法使用权力与非法使用权力之间作出规范性区分的批判理论来调合。为了作出这样的区分，哈贝马斯引进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话语的理想化的前提通过“话语的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得到了认同和证明。福柯向这一先决前提的存在提出了挑战，而哈贝马斯则试图赋予这些前提以普遍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在处理批判与权力的哲学话语时采取的立场根本不同，福柯将权力与批判联结起来，认为权力本身就是推论性的，而批判只是与权力相关的众多推论实践中的一种。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样一来权力无疑会削弱理性的基础和批判的实践效用，因此，他认为哲学话语应该分离批判与权力，而批判的作用是使权力搁置起来，然后来证明在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中被从实用主义角度预先假定的普遍规范是否合理。这无疑承认了话语和权力都是自主性的领域，

而这正是福柯要否定的东西。福柯认为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由启蒙运动开创的批判的普遍性应得到保存,而福柯则认为必须保存的是对启蒙运动这个事件及其意义的提问,因而他把批判性思考界定为对被认为是普遍的和必要的东西的提问:“我的目标之一是向人们表明,许多他们认为是普遍的、是他们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些非常确切的历史性变革的结果。我所有的分析都是为了反对关于人类存在着普遍的、必要性的想法。”也就是说,普遍性,像主观性和理性一样,必须从界定启蒙运动的特性,即历史性这一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对福柯而言,普遍性的历史性就是主观性和理性的历史性的后果。在这个语境中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被指称的普遍性的调查,这牵涉到把它们与历史性的其他形式联系起来的问题。例如,当福柯批判人文主义时,他的观点并不是要拒斥它的所有原则,而是向人文主义对普遍性的要求提出挑战,即把它的自我理解当作一种非历史性现象来揭露:“关于人文主义我所担心的是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向任何种类的自由展现了我们伦理学的某种形式。我认为在我们的将来存在着比我们能在人文主义中所想象的更多的秘密、更多的可能的自由和更多的创造性。”因此,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认为当福柯在一组推论的实践和权力的关系中追溯人文主义的历史起源时,福柯的目的是要理解人文主义的现时形式是如何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探讨未来的选择形式。福柯的这些方法同哈贝马斯重新追溯现代性哲学话语道路的起点的方法极其

相似。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历史性论辩和批判。

那么，福柯为什么又总是向普遍性挑战呢？根据德鲁兹的看法，理由是因为普遍性也是历史性的，因而不能解释任何东西，事实上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他认为在社会体制中，普遍性（例如自由）没有其他的意义，无非是使对一种不断变化的估计成为可能，它们表明了一种历史性过程。福柯关于普遍性所要具体地拒斥的仅仅只是传统地赋予它们的那种非历史性，而他则承认以德鲁兹方式解释为历史中的变量的普遍性，这意味着他挑战的是普遍性的必要性，而不是普遍性本身。福柯把普遍性理解为变量，并不意味着他像哈贝马斯所驳斥的那样因此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某种形式，即认为知识和理性的所有形式都是等同的，因为它们同等地从属于权力关系。

对于普遍性的坚持与拒斥，的确是哈贝马斯与法国思想家发生冲突的焦点，德里达对普遍性与确定性的颠覆是最激进的，虽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都共享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成果，但理论取向却大相径庭。哈贝马斯抨击利奥塔背弃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积极的方面，从而陷于非理性主义，这一指责也完全适用于德里达。利奥塔则认为，这样的抨击带有一种将理性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特点，在他看来不存在单一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的理性。不存在一个巨大而唯一的理性，这只是一种空想，相反，却存在着多元的理性，至少存在着各自独立的理论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美学的理性，这些理性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忽视这一点恰恰是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中理性唯心主义的显著特征，他们假定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样的，这种理性同一论和理性绝对论正好是一对，都是错误而危险的。

布尔迪厄也反对哈贝马斯式的普遍性规范,他主张以一种坚定的历史决定论的方式探讨规范问题和理性问题,他从不关注“普遍性的兴趣”存在与否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谁对普遍性感兴趣?对某些行动者来说,如果对普遍性感兴趣,必须达到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他关注的是某些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其中行动者为了满足他们独特的兴趣,而尽力创造了某种普遍性?这些场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在其中行动者感到必须以普遍性的保卫者自居?布尔迪厄只承认在某些场,在某一时刻存在着对普遍性感兴趣的行动者。同时,他也认为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被历史性地决定的。存在着理性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降格为它的历史,而是意味着使真理的产生成为可能的那种交流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存在着历史条件。

我着重强调哈贝马斯与法国思想家之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忽视法国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四位法国思想家思路各异,也时有交锋,比如利奥塔在批评德里达时,援引他批评康德的话:“批判美学在使形而上学衰退的同时,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他认为德里达有陷于“不在场”的本体论的危险。利奥塔认为“不在场”的概念本身是由德里达本人所构造的,德里达认为任何存在都可能是不在场的,因而不在场比存在本身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但利奥塔认为“不在场”这一概念有流于简单之嫌,因为至少存在的不在场是在场的,存在本身是在不在场中显现的,如果它是不在场的,那么它也就是在场的。其实,德里达与利奥塔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对差异概念的界定上,德里达把差异运用于所有风格、所有话语和所有联系上,并通过对所有的事物作出区别来显示所有联系和话语的差异。德里达因此

而遭受了陷于怀疑论的指责，利奥塔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怀疑论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同义词，但他又强调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种指责的合理性。在利奥塔看来，差异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而后者则来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并为海德格尔所发展。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概念是一切图式的图式，也就是给定的所有内在综合的形式。这种给定的内在综合形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详细地阐述过，这种形式从属于某种真假攸关的语言游戏。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二个《批判》中的时间性问题，也就是伦理学的时间性，马上就会碰到另一类困难，因为它们涉及的是义务的时间。但在第三个《批判》中，对那些适用于审美感受力和趣味的综合所作出的细致考察，明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里的时间性也是与第一个《批判》完全不同的，这并不是自我与其本身的不同，与其说第一个《批判》所考察的时间综合似乎是悬而未决的，还不如把它归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审美判断中，这种综合可以既不是认识的，也不是再现的。鉴赏本身是在一种最初始和最低限度的方式中被理解的，所以，人们便被引导去构想一种审美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完全不属于差异的等级，它遵从的不是第一个《批判》所涉及的东西，而是一种似乎悬置或阻断的时间状态，这种状态简言之就是差异本身的一种“中断”。

利奥塔认为在审美时间中重要的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在场”的东西，“在场”并不是指“目前”，也不是指“什么存在”，而是说在“在场”中，对进入形式的给定的材料所做的初始综合活动是悬置的，在“强烈”的审美瞬间，很可能思想与材料是处在一种非间接的关系中的，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综合活动。德里达显然不会同意这种有形而上学之嫌的论

述,但利奥塔则认为德里达过分迷恋于维护思想活动的统一性,因而“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而布尔迪厄在《区分》中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康德的审美判断与学术场之间的关系。

尽管四位法国思想家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尽管哈贝马斯与他们的冲突那样显眼,但正如迈克尔·凯利所说,这五位思想大师仍然具有根本性的一致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拒斥康德的批判范式,这一批判范式是建立在先验的、自我建构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体这样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一概念在胡塞尔等现象学家手中得到了延续,又被萨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哲学的形式接收过来。但是,拒斥这一批判范式恰恰是在20世纪后期区分哲学家的一大标志。这五位思想大师都同意,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分别证明其真理性和公正性,因为它们不可能再依靠宗教、形而上学或任何其他传统的、规范性的基础。因而批判是这些科学的哲学组成部分,它将提供这样的证明,同时批判又必须证明自身的准则,譬如,伦理学如何能合法地运用一个非普遍性原则来决定哪些伦理准则是有效的,而却又不去证明那条非普遍性原则呢?换句话说,这一困境是由于知识与批判在丧失了外在的参照性后,只能自我参照才形成的。凯利认为正是这个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使当代哲学家陷入了一个潜在的陷阱,他们在共同抛弃了康德的批判范式后,并没有认同另一个取而代之的批判范式,这无疑削弱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基础,因为正是这种仍未被认同的批判范式,支撑了当代哲学中的身份意识与批判性的反思。其实,在知识只能自我参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批判,是一个摆在所有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

艰巨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

本丛书的策划、编选、翻译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由于时间的仓促，再加上编者、译者的学识所限，错误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客居美国期间，曾与明尼苏达大学的刘擎先生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作了广泛的交流，没有这些交流也不会有编选这套丛书的想法；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邹羽先生为本丛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张迅博士，在编者启程回国后，代为邮寄了大量编者无法随身携带的资料，而且在本丛书的编译过程中，对编者所急需的资料，总是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在此致以特别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唐继无先生，他在本丛书的策划、编译以及后期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没有唐继无先生大量艰辛、细心和耐心的工作，这套丛书不可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包亚明

1996年12月2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包亚明(1)
自画像.....	(1)
精神之旅与“心灵”快照	(43)
游戏规则与婚姻策略	(57)
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79)
反观社会学的真谛	(92)
社会学危机与争夺词语的斗争.....	(110)
场的逻辑.....	(139)
利益、习性、理性.....	(162)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189)
译后记.....	(212)

自画像^①

问 你能否谈一下在你学生时代,知识界的情形是如何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或其他什么流派大行其道?

答 我在50年代作学生时,现象学正处于巅峰时期,而且正呈现出存在主义的多样性。我很早就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然后又接触了梅洛-庞蒂和胡塞尔。当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纯知识分子理论而存在的,即使有些人通过强化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联系,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确定的形象。然而,我当时的确从学术理由出发,研读过马克思著作。我对青年马克思特别感兴趣,《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曾令我心醉神迷。但那是个斯大林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我的许多同学,现在都是极端的右翼分子,而在当时却都加入了共产党。在1951年左右,由斯大林主义所施加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迫使我们(包括

① 布尔迪厄与奥尼希(A·Honneth)、凯什巴(H·Kocyba)、斯克维布(B·Scwibs)1985年4月在巴黎作了这次访谈,本文后以“围绕符号秩序的斗争”为题发表于德国《美学与交流》(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1986年第16期。现标题为译者所加,文中标明“答”的部分为布尔迪厄的话,标明“问”的部分,则为其余三位参加访谈者的话。——译注

德里达、比昂科、孔特、马林、帕林特和其他一些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捍卫自由,而该委员会在巴黎高师的共产主义小团体里则遭到了一致谴责。

当时大学里所教的哲学并不很具有启发性,尽管大学里有一些优秀的教师,如亨利·古希(Henri Gouhier),我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的(“莱布尼茨‘批评集’之翻译与评论”),另外还有加斯东·巴歇拉尔^①、乔治·康吉埃(Georges Canguilhem)。在巴黎大学以外,尤其是在高等研究学校和法兰西学院,还有埃里克·威尔(Éric Weil)、亚列山德拉·柯叶(Alexandre Koyré)和马夏尔·盖鲁(Martial Guérault)等优秀教师,我在巴黎高师上学时听过他们的课。所有这些人的课都不在通常的教学安排之列,但正是由于他们和他们所讲述的东西,即科学史和严谨的哲学史的传统(也由于我对胡塞尔的阅读,他的作品在那个时候还翻译得相当少),我同其他一些和我一样对存在主义有点厌倦的人,一起试图超越仅仅阅读经典作家,并试图赋予哲学以某种意义。我开始钻研数学和科学史。对于我和其他几个人来说,乔治·康吉埃和朱尔·维莱曼(Jules Vuillemin)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真正的“典范的预言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时期,他们并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们似乎指出了开创一条新路的可能性,指出了完成哲学家的角色的新方法,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于那些只是模糊地提出一些大问题的论述。值得一提的还有《批评》(Critique)杂志上的评论,当时《批评》正处于鼎盛时期,有亚列山德拉·柯

^① 加斯东·巴歇拉尔(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法国哲学家,在科学哲学和诗学两个领域成就斐然。——译注

叶、埃里克·威尔和其他一些人为其撰稿；在《批评》杂志上可以同时看到有关法国和国外的研究工作的信息，这些信息范围极广又非常精确。我，由于社会学的缘故，不像其他人（例如，福柯）那样受到《批评》的另一面，即巴塔耶^①、布朗肖^②那方面的吸引。一种划清界线，而不是超越界线的欲望，把我引向了另一条道路，即反对体制的权力，尤其是反对大学的体制及其隐藏的所有暴力、欺骗和道貌岸然的蠢行，以及反对那个体制背后的社会秩序。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跟资产阶级家庭算账，因而我较少拥有《继承人》^③中所谈论的那种象征性决裂。但我认为，我始终坚持阿多诺所说的“不参与性”（从知识分子的基本原则出发，拒绝向体制妥协）。

我同“结构主义的”一代人[尤其是阿尔都塞和福柯，而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首先因为我同他们相差一个学术代（我听过他们的讲座），还因为我拒斥时尚性的东西。]所分享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倾向，可以由反抗存

① 乔治·巴塔耶(Bataille, 1897-1962), 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 虽然没有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 但与该流派十分接近, 对其色情、幻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很欣赏。巴塔耶的文学作品充斥着对死的恐惧、对肉欲的追求和对超现实的信仰。近年来巴塔耶的理论著作, 日益受到西方哲学界和批评界的重视。——译注

② 莫里斯·布朗肖(Blanchot, 1907-?), 法国散文作家、小说家, 他处于各种流派影响的十字街头, 其作品十分独特和玄妙, 具有一种悲观的否定的哲理。其理论著作近年来也十分走红, 布朗肖和巴塔耶的“旧曲新唱”, 多少得益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等法国思想大师的力捧。——译注

③ 《继承人, 学生与文化》(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是布尔迪厄与 J·C·帕瑟朗(Passeron)合著的, 1964年由巴黎出版社出版, 1979年在芝加哥出版的英译本, 定名为《继承人, 法国学生及其文化的关系》。

在主义所代表的下列东西的这种需要来解释：甚嚣尘上的软弱的“人文主义”，“对亲历亲为的经验”的自鸣得意的呼吁，以及今天在《思想》(Esprit)^①中依然存在的那种政治道德主义。

问 你从未对存在主义有过兴趣吗？

答 我读过海德格尔，我读了很多他的作品，并且带着某种迷恋，尤其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反对公共时间、历史等等的分析，这些分析与胡塞尔在《观念》第二卷中的分析一起，在我致力于分析社会日常经验时对我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就像舒茨(Schütz)对我的帮助那样]。但我从未真正进入存在主义的状态。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梅洛-庞蒂是独特的，他对人文科学感兴趣，对生物学也感兴趣。当我们对于目前现状的关注，与政治性讨论的宗派主义的过于简单化不相吻合时，梅洛-庞蒂会让你了解这种对于现状的思考应该是怎样的，例如：在关于历史、关于共产党、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写作中，他似乎超越了学术体制中存在的哲学上的啾呀学语，而体现出一种极富潜能的方式。

问 但在那个时候，哲学不是被一个社会学家所统治着吗^②？

答 没有。那正是体制性权威的结果。我们对于社会

① 《思想》是一本政治和文学评论刊物(有广义上的基督教和左翼的倾向)，创立于1930年，在二战中成为抵抗运动的一个写作论坛。——译注

② 指乔治·达维(Georges Davy)，涂尔干学派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涂尔干(Durkheim, Emile 1859—1917)，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奠基人，认为劳动分工是社会团结的基础，“集体意志”在社会中有决定性作用，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工》、《论自杀》等。——译注

学的轻视被这样一个事实强化了：即一个社会学家可以是竞争激烈的取得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的考试中的哲学科目考试的考官委员会主席，因而他能强迫我们去听他关于柏拉图或卢梭的讲座，而这种讲座在我们看来，简直糟透了。这种对社会科学的轻视，在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学生中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因而也是统治的模式），至少一直延续到60年代。那时，唯一存在的社会学是平庸的，并且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其背后没有任何理论性的启迪，事实上也没有经验主义的启迪。巴黎高师的哲学家对这一事实深信不已，而这种确信又被下列人物进一步强化，即20年代或30年代的社会学家，诸如让·斯托茨（Jean Stoetzel），甚至乔治·弗雷德曼（Georges Friedman）之流，后者写了一本关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破书，在哲学教授们眼里社会学是一种否定性的职业才能的产物。这种情形对于战后第一批社会学家的影响更是明显，他们（只有少数人例外）没有遵循传统的道路，即进巴黎高师和参加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的考试。在有些人看来，社会学家是因为在哲学方面的失败才不得不转向社会学。

问 然而发生在60年代的变化又是怎样产生的？

答 结构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门社会科学第一次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实际上是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列维-斯特劳斯把他的科学命名为人类学（anthropolgy），而不是人种学（ethnology），这样，就把盎格鲁-萨克逊的意义同古老的德国哲学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了（几乎同时，福柯正在翻译康德的《人类学》^①，他使得通过借鉴索绪尔和语

^① 指康德的《实用主义观点的人类学》，福柯翻译，（巴黎，1964）。